

安家瑶老师是我敬重的学者，安老师曾长期主持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都城——隋唐长安城的发掘与研究；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主任，西安研究室主任，一直从事汉唐考古、城址考古与保护。1997 年被德国考古研究院聘为通信院士，2013 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唐城考古·丝路玻璃》，是中华书局 2024 年 9 月刚出版的安老师文集，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中的一部，多数文章以前读书工作中学习查阅过，再读，重新感受安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问智识，还有令人感动的考古工作者的责任担当。这部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为考古篇、古代玻璃篇和文化遗产保护篇，这种编排非常能够彰显安老师的人品与学品。

考古重地的深耕与贡献

文集的第一部分收录了安老师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潜心之作与收获。第一篇《中国考古学的九十年》，是 20 世纪 90 年代应美国朋友之邀，为一次出土文物展览写的一篇考古学术史的简要回顾，2012 年在美国发表，2013 年在国内刊出。文章将 1921 年至 2011 年的中国考古学做了五个阶段的划分，选取考古学发展史上重大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回顾了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同时不回避矛盾，文章的最后点出了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考古力量不足；古墓葬、古遗址盗掘严重；社会大众对考古学的误解；10 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首，这些问题都在持续得到改善。这篇精炼的学术史在记述大事件的同时，也插入了小细节，如庙底沟的发掘，文中特意加入当年考古队员说的话“白天听黄河咆哮，夜晚听野狼嚎叫”，以展示考古队员面对艰苦条件的乐观主义、细节让学术史鲜活，饱含着安老师对前辈师友和父辈的深厚感情与自豪。

陕西西安，二三十年前当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艰辛，是现在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唐长安城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长安城的圜丘及其源流》《唐大明宫含元殿龙尾道形制的探讨》，每一篇论文的背后都是一场艰苦的发掘。西明寺是唐长安城的重要寺院，通过对西明寺的几次发掘，证实了西明寺位于长安城延康坊的西南部，占四分之一坊之地。发掘虽然只是西明寺的一小部分，但为研究中国佛教寺院布局沿革积累了宝贵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研究，安老师还研究了西明寺对日本奈良佛教的影响，指出“日本奈良大安寺是模仿唐西明寺的伽蓝配置”，对唐西明寺对大安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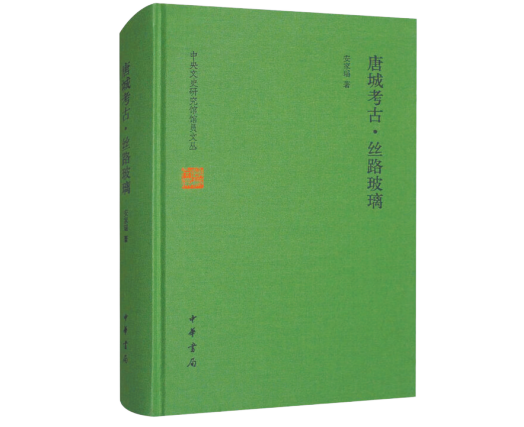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是古代的一种国家重要祭祀活动。隋唐长安城的圜丘建于隋，沿用于唐，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象征。根据田野调查结果，1999 年，安老师带领西安唐城队对隋唐圜丘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搞清楚了圆形四层坛体、十二层陞阶、素白坛表等形制特征。安老师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考古所成立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所写的论文，圜丘遗址的发掘资料是当时最新考古工作进展的披露，大家都很振奋。文中安老师还深入探讨了隋唐圜丘形制的渊源，以及唐以后圜丘形制的演变。唐长安城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在已是知名的旅游打卡地，每天无数身着唐装的俊男靓女摩肩接踵到此感受唐文化的魅力。古都热的背后是考古人几十年持续不断埋首田野，寂寞坚守，孜孜以求的结果。

含元殿是唐长安城大明宫的正殿，田野发掘工作于 20 世纪 50 年代、90 年代都进行过。90 年代是为保护含元殿而进行的发掘，在安老师的带领下，采用大面积揭露的方式发掘了 27000 平方米，这次发掘对含元殿的柱网布置、大台形制、龙尾道位置、建殿时的砖瓦窑址、殿前广场、含元殿与朝堂的相对位置等问题建立了新的认识。《唐大明宫含元殿龙尾道形制的探讨》简要介绍了 90 年代的发掘，对含元殿龙尾道形制的可靠性进行了研究，认为龙尾道设在殿堂两侧的形制很可能创自唐大明宫含元殿。图文结合，层层递进，探讨了含元殿龙尾道形制对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和邻近国家的影响。

在考古部分里还收录了两篇出土文物的研究文章，《唐代黑陶钵考》和《西安沣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根据唐西明寺和青龙寺黑陶钵的发现，研究认为远古时期的黑陶工艺在唐代曾一度复苏，对大都会博物馆存的一件圆底敛口黑陶钵从形制到工艺技术都做了认真研究，对其时代给出了新的认识。在《唐代黑陶钵考》文末有一句话“认真整理发表这些遗物，并分析研究这些资料，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社会担当，也是学者做学问搞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常设展中有一件珍贵展品——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这件文物出土情况特殊，既不是科学发掘出土，也没有同出器物作为参考，安老师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从画面内容、绘画风格和印刷特点分析，推测这件经咒的年代为唐玄宗时期，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诞生时期的重要印刷实物。

考古人的学问之路与社会责任

——读《唐城考古·丝路玻璃》
巩文



学术兴趣长时段专攻的权威之路

与古代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等的研究比起来，古代玻璃的研究是非常小众的。

古代玻璃研究这一学术兴趣在安老师研究生期间就形成了，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西汉至北宋的二百余件玻璃器皿进行整理和考察，系统研究了中国早期的玻璃器皿，1982 年完成了论文《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1984 年在《考古学报》发表；1986 年，大英博物馆东方陶瓷协会译为英文独立成书出版。如今依然是研究中国古代玻璃器必读的重要文章。

四十余年来，玻璃研究一直是安老师的学术兴趣所在，从研究生时代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玻璃器皿的研究，到工作以后对各种考古发现，墓葬、遗址、沉船、寺院等出土水的玻璃器进行追踪式研究，发表《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玻璃考古三则》《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南汉康陵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辽祖陵 1 号陪葬墓出土的玻璃器》《谈泾川玻璃舍利瓶》《试探大云山汉墓出土玻璃编磬》等。考古发现的玻璃器比较零散，安老师大海捞针，串起中国早期玻璃器发展的脉络。安老师的研究以小见大，一只碗、一个瓶、一颗珠，用严谨的传统考古学方法，细致地考察出土地点、共存器物、器物类型、器物纪年、器物装饰等，同时，她以传统的考古学方法结合古文献研究，以及先进科技手段的检测，对古代玻璃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

安老师的研究注重与国外相关资料的对比，以探讨中国玻璃的起源、发展与传播，发表《我国古代玻璃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伊斯兰玻璃和中国出土的伊斯兰玻璃》《中国古代玻璃与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饰》《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夹金箔层的玻璃珠》等。安老师的研究从小处着手，但视野极其广阔，她十年前就开始研究的提案是当时还不太关注的古代玻璃，但学术落脚点是丝绸之路中西文化的交流，关注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的学术问题，探讨的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大学问。这样的研究既是遵从内心的喜爱，也是对夏鼐、宿白、马得志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优良学术传统的传承。

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担当

安老师在后记里写到“当时最大的困扰是社会对考古的误解和对文化遗产的漠视”。安老师以自己多年的考古工作实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一份份有价值的提案，这些提案逐渐地一一落地。

2012 年 3 月安老师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国家考古博物馆的提案》，代表了考古人的心声，2023 年 9 月 15 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迅速成为北京热门博物馆之一。作为考古博物馆的首任馆长，考古博物馆建设的亲历者，今天捧读这篇提案，依然感受到安老师的拳拳之心。

2005 年，安老师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关于做好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抢救工作》的发言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使南水北调的考古问题得到解决，为南水北调沿途的文物抢救和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 年《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提案，充分体现了考古学工作者对文化遗产的守护之情，充分体现了考古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感。2012 年 3 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全面推进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作的提案》，助力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2014 年 6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考古人的力量。为了宣传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申遗成果，2017 年在香港举办了“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大型文物展览，我也有幸参与了展览的策划，深切感受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喜悦和丝绸之路积淀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的魅力。文化遗产保护篇这一组文章里还涵盖了对宫殿遗址、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等的思考与研究，结合了考古工作的实践和探索。

阅读这本文集也有三个小小的遗憾，其一是书中图片都是黑白的，那些流光溢彩的玻璃器皿、琉璃珠全无光彩。其二，安老师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都是大遗址，宫殿、天坛、寺院、都城，气势恢宏结构复杂，书的开本偏小，考古线图和全景照片的效果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其三，安老师的政协提案不少得到了采用，比如南水北调的文物得到了保护，考古博物馆建成开放等，书中如果能配上一些相关图片，会更加丰满。

安老师研究的贡献不仅具有深厚学术价值，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这部文集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更为我们展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对文化遗产的热爱融于生命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扛在肩上的考古学家的社会担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唐城考古·丝路玻璃》

作者：安家瑶

出版时间：2024 年 9 月

出版社：中华书局

宝藏传说，史不乏载，民间更多。

四川便流传着一个著名宝藏传说：江口沉银。

据说张献忠当年撤出成都时，携带了一批财宝。行至今眉山市一带，张献忠突遭明军将领杨展伏击，激战之后，献忠大败，船队与船上所载珍宝，俱沉入锦江与武阳江相交处。锦江与武阳江，其实是岷江分流而成，二者合流之后，再奔东南。相合之处，又称“江口”。

张献忠沉银时曾封锁消息，但终究纸包不住火。藏宝消息不胫而走，并且越传越神、越传越乱，藏宝之处也由江口滋生出青城山、峨眉山、成都、新津等地点。当年张献忠江口沉银有亲眼所见者，一位叫欧阳直甚至描述了细节：献忠沉宝时曾将金银装入“木鞘”，然后沉江。“木鞘”之说，后来觉得证实。据《蜀难叙略》记载，杨展击溃张献忠后，获悉沉银之事，令人“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从顺治到乾隆年间，不断有人在江口打捞出金银；道光、咸丰年间，二帝曾先后派官员在江口寻找张献忠的“沉银”。“木鞘”也不止一次被发现。因此张献忠江口沉银，既是秘密，又非秘密。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献忠沉银一事逐渐被淡忘，到江中打捞宝藏的行为也逐渐绝迹。沉银一事，似乎被“封存”了起来。

2005 年，沉银之事再起波澜。是年，彭山县（今彭山区）政府为解决当地居民饮水问题，在岷江河道内铺设管道。施工过程中挖出一段木鞘，内有五十两的银锭 7 枚。银锭刻有湘潭、京山等地名，经鉴定其时代系明代。岷江出水金银的消息，再度招致少数人以身冒险。2014 至 2016 年间，眉山警方以案犯手中追缴金银、银锭、金册、银册、“西王赏功”币以及各种金银首饰若干。

岷江江口持续发现金银的事实，让文物考古界决定组织力量正式发掘。志岩先生的这部著作，讲述的便是江口考古过程。

考古发掘与盗掘文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挖宝，而前者是科研。许多学者认为：过往的历史，只有通过正式考古发掘获得地下文物证实，才能转化为“信史”。一些执拗的学者为了“表白”自己学术严谨，常常会瞪大眼睛给考古结论找碴儿。对于张献忠沉银或藏宝这类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必“严密监视”。即使江口一带历年都能打捞出明代金银，即使出水过“西王赏功”币和“大西大顺二年”金册，但只要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就无法证明张献忠曾经藏宝于此。因此江口发掘的首要意义，便在于对张献忠当年是否在江口沉银给出结论。这就决定了发掘不能有丝毫差池，发掘主持人须谨慎行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终决定由志岩先生主持江口发掘。尽管他自己说是因为此前他曾在彭山“考过古”。实际情况是当时需要一位有水准、有能力的学者，方能担当此任。

施加在发掘主持人身上的压力，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受到了。

中国考古学家的陆地发掘，水准早已领先世界。在殷墟，发掘技师凭借一把小铲、几根钢钎，便能将朽蚀在黄土中的商代木质马车清理“剥离”出来。沉船打捞及水下发掘也有先例。我曾应邀参加广东“南海一号”沉船的发掘方案论证会，会上 9 位专家经反复讨论，最终拿出的方案是将“南海一号”沉船拖至海岸，排水之后再采用陆地作业的方法发掘。然而江口沉银的发掘既非陆地发掘，又不同于“南海一号”，毕竟沉在水下的明代金银散布范围远大于一艘沉船。

刘志岩决定召开论证会，以期讨论出合适的发掘方案。参加首次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论证会的均是国内重量级学者，既有经验丰富的田野考古学家，也有专门从事金银器研究的学者，最终大家选定了“围堰式发掘”。

所谓“围堰式发掘”，是先在水中修建围堰，然后把围堰内的水排干，将水下环境转变为陆地环境，再按陆地方法发掘。“围堰式发掘”是在潜水考古和整体打捞都不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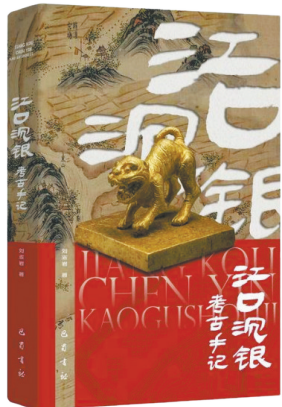
礼、乐、射、御、书、数不仅是我国先秦时期六艺的重要内容，也是孩童教育与官吏选拔的重要途径。弓箭，作为冷兵器时期最重要的武器装备，更是作为六艺之一“射礼”的重要载体。射礼在先秦时期的出现、发展、确立一直受到关注，王绍之《西周大射礼研究》、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杨杰《经学视域下的先秦射礼研究》等专著对先秦时期射礼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认识。秦汉及以后射礼的发展，相比之下受到的关注则较少，顾涛《中国的射礼》等专著曾对其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讨论。文物出版社于 2023 年 10 月出版的贾一凡博士《弓箭礼仪文化研究》一书，从纵向的视角，系统展现了商至明清时期弓箭礼仪文化的变迁，为我国射礼的研究与普及提供了新的参照。

该书共七章，分为绪论、殷商时期的射礼、西周时期的射礼、东周时期的射礼、秦汉时期及后世的射礼、娱乐礼仪—投壶、举行射礼和投壶的意几部分。全书在将弓箭礼仪文化分为射礼、投壶两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射礼分为田猎射、巫射、武射、文射、风俗射几类。通过大量的甲骨、金文、铜器画像纹、画像石、书画及发掘的兵马俑禽坑、投壶等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不同时期射礼、投壶的种类、性质进行多方面的考证。在具体问题上，书中百家观点进行汇释，得出了令人较为信服结论。书后附甲骨、金文、简帛著录简称与射器及其功能汇总表，图文并茂，也使读者对相关问题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先秦时期是射礼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也是该书用力最多的部分。殷商时期的射礼通过花东甲骨考证了“子”是殷商王朝宗室的身份，以及子射的地点与程式；通过作册般铜谥论述了商王射礼的仪程。进而认为殷商时期的射礼仍较原始，但种类增多，仪式性渐显。西周时期的射礼通过文盩盂、令鼎、噩侯驭夷卣、爰方尊、井鼎、静簋等传世或发掘青铜器铭文，在对铭文进行详细汇释的基础上，考证了西周时期大射、燕射、宾射、射牲、射鱼、周王习射、小子射时，通过传世文献考证了西周时期巫射、郊射等内容。总结西周时期射礼种类多、规模大、礼制突出、政治与娱乐性开始显现的特点。东周时期通过春秋晚期开始出现铜器画像纹与《左传》等材料，考证了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弋射、武射的形式与仪程。总结东周时期射礼的规格，规模较西周有所下降，但大夫、士等中下层贵族的参与度开始上升，娱乐与世俗化也进一步加深。然而，西周时期前后存在礼制的变化，其墓葬棺饰的构筑、青铜器新纹样题材与组合的出现、器用组合的变化等在中期前后皆有体现。这些转变不仅是西周时期周人统治格局的进一步稳固，也是“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的体现。射礼在发掘过程中如静簋等西周中期的器物所展现的贵族子弟射礼，其他中、晚期器物展现的燕射、射牲等内容以及西周射礼种类、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等变化，与殷商时期的射礼相比已有损益。这些改变皆与礼制变化存在联系。东周时期，画像纹是春秋晚期前后出现，一直延续至两汉的一类新的青铜器装饰艺术风格。东周时期画像纹题材包含狩猎、射礼、祭祀、宴乐、水陆征战、采桑、神怪、动物等多种题材，不同题材在组合与器类选择上有较为复杂的关系，而且区域间的组合也存在差异。画像纹题材中祭祀、射礼不仅有礼仪的展现，其水陆

《江口沉银考古手记》序言

唐际根



科学发掘，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随后便是荣誉加身。2018 年 4 月，江口沉银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 年 6 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国家博物馆从 30000 余件文物中精选了 500 件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享受到了最新的考古成果。我有幸参加了开幕式，清晰记得当时的盛况。

发掘是考古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发掘现场的基本问题，如文物出水前的位置何在？怎么让文物出水？文物当年如何沉底？沉底之后的数百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除了这些，刘志岩和他的团队还要解决更多深层学术问题，例如出水文物有哪些类别？银锭、银钗、金册纯度如何？功能如何？张献忠当年通过什么手段，又从何处获得各种金银制品？明代末年的“大西”辖区内一枚银锭购买力几何？等等。

深层学术问题的回答需要时间，最终给出答案可能要等发掘结束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但考古队显然已经着手研究这些问题。他们通过测绘 3D 地图标注出水文物的位置；从水动力学和物理学角度分析文物的沉底位置与外观变迁；利用 XRD、XRF、SEM 检测文物成分和观察文物伤情。这些工作都属于为回答上述问题做准备。而人文社科角度的研究更是伴随发掘始终。仅仅一枚“蜀世子宝”印，便揭开了张献忠劫掠蜀王府、霸占明代蜀王之物的史实。倘若有更充裕的写作时间，我想志岩先生会列举部分成分检测和文物伤情探测结果以飨读者。

考古学有三大基本功能：证史、补史、构史。江口沉银遗址经过 6 期考古发掘，出水文物总计 70000 余件。如此丰富的文物，最终会勾画出一幅怎样的历史画卷呢？志岩先生的这部著作，算是反映整个江口考古工作的序曲，我们期待第二部、第三部江口考古成果陆续出版。

这部书最大的“看点”是选题。毕竟江口沉银的考古背景是有着“屠蜀”恶名的“张献忠绝唱”，是社会广泛关注的历史事件。依托这样的背景写作，其实是巨大的心理挑战和学术挑战。我猜想志岩先生写作此书的心境既是急促的，又是从容的。从容表现在书的内容与结构。全书以时间为序，叙述发掘缘起、发掘过程、管理过程和科研工作，又不时插入各种考古常识，普及考古类别、勘探技术、发掘方法、考古与盗墓的区别等，还插入国内各大学考古专业的设置，甚至不惜笔墨介绍发掘过程中的志愿者招募、田野工作现场的婚礼以及疫情期间大家的工作与生活。这样的编排，使得读者在围观“围堰式发掘”、享受末重大历史事件的特殊魅力的同时，还能顺便了解考古，称得上独树一帜。

2019 年，我曾在江口考古现场听志岩先生介绍发掘过程。承蒙周颖女士惠赠志岩先生大作，一口气读完，仿佛又回到美丽的岷江，并遥想起明代末年的历史烽火。遂写下上述文字，为江口发掘这次重大考古活动有了一部已述全程的重要著作道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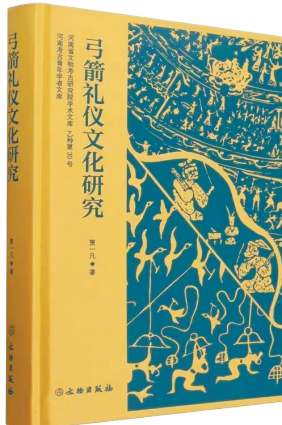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暨高等研究院讲席教授）

《江口沉银考古手记》

作者：刘志岩

出版时间：2024 年 10 月

出版社：巴蜀书社



展过程中集中出现在何时？不同射礼之间出现的先后关系？以及东周时期射礼为何会作为画像纹重要题材之一等问题，本书未有论述，皆是较为可惜的。

秦汉至元明清时期的射礼，向娱乐化、世俗化加速迈进。随着社会的动荡与朝代的更迭，两周时期的射礼已经越来越模糊，成为遥远的礼制回忆。虽然有识之士曾对射礼的娱乐化进行过礼制的努力，但终究抵挡不住逐渐下沉与娱乐、世俗化的趋势。本书通过兵马俑禽坑、汉画像石、书画的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形象地展现了射礼的世俗化趋势。直至西方技术的传入、热兵器的发展与国门打开，射礼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投壶是随着两周时期射礼的发展而产生的，除礼乐教化、政治博弈等功能外，从一开始就具有娱乐的属性。西周晚期平王东迁后，原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体系开始逐渐崩塌。周、郑交恶，以及后来的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事件，使原有以周王为天下共主的血缘体系彻底土崩瓦解。铜器、玉器等器物原有的礼制体系也逐渐被侵蚀，铜器纹样原有神祇的题材也被几何纹、画像纹等更新颖的题材所代替，祛魅与世俗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因而，投壶器具在该时期的发现，也就不足为奇。投壶造型的确立，在秦汉以后随着娱乐化的进一步显现，以及女性等多样化群体的参与，其造型的娱乐属性也更加明显。同样，随着射礼的烟消云散，投壶也一起隐没于尘埃。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在射箭女子个人赛中，终结了韩国射箭队在奥运会上连续 24 年夺冠的纪录，也实现了中国在奥运射箭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此后，随着射箭运动的普及，该运动越来越被大众所熟知与接受。然而，射箭作为运动项目越加普及之外，背后蕴含的礼仪文化却鲜为人知。弧矢重悬旧礼仪，《弓箭礼仪文化研究》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在运动普及之外，可以使射礼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虽书中对不同射礼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仍有缺憾，但瑕不掩瑜。该书通过甲骨、金文、画像纹、画像石、书画、传世文献等材料，纵向展现了先秦至明清时期弓箭礼仪文化的发展，是普及射箭礼仪、增强文化自信、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力作。
[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编号 2024QQJH05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弓箭礼仪文化研究》

作者：贾一凡

出版时间：2023 年 10 月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